

第一，从科学研究中完全剔除目的性价值判断与意识形态判断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回顾科学的历史就会发现，通常正是由于附带了目的性价值判断，才导致了科学研究的新发现和创造。

第二，即使科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掺杂目的性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判断，“认识的客观性”还是有可能通过努力克服目的性价值判断与因果性价值判断之混同得以确保。

第三，即使我们克服了上述的混同，也确保了“事实认识的客观性”，研究成果一旦被政治、经济目的所利用，研究者仍然要在方法论上负有社会责任，并应该自觉认识到这一点。

第四，抱有科学研究可以排除目的性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判断这种错误认识的研究者，在其研究成果被某些特定政策集团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目的所利用时，由于本人认为与此无关，当然也就不会自觉认识到在方法论上必须对社会负责。在这个意义上，持第四种立场的研究者更有犯双重错误的危险性，即混淆目的性价值判断与因果论价值判断的危险性，以及缺乏应对自己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负有社会责任的自觉认识之危险性。

实际上，今天的日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还很难说在方法论上已经克服了上述问题。特别在现代中国研究领域更是如此。笔者将通过对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的发展轨迹进行简单回顾来验证这一点。

[III]

现代中国研究方法论之自觉意识的欠缺

(1) 战前战中的中国研究及其方法论问题

“事实认识的客观性”由于目的性价值判断与因果论判断的混同而受到影响的例子，不仅在战前战中作为国策研究的中国研究中，在今天的日本中国研究中也屡见不鲜。

作为外国研究的现代中国研究和其他的外国研究一样，在理论上不可能具备作为主体参与研究对

象国中国的社会改革和变革的实践性。因为社会改革和变革只能由当事国的人民作为主体来实现。

但是回溯历史，战前和战争时期的研究者却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境界，亲自尝试去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和社会变革进行实践性的参与，并且的确参与了某些事件。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部分日本研究者又开始了与中国政府的决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并出现了某些带有参与中国的决策和社会改革之意图的情况。²³

首先探讨一下战前战中的事例。这些事例主要存在两种类型（category）。

第一种类型就是日本侵犯他国主权，在占领地实行殖民统治的情况下，研究者在政策上进行参与。为了确立对华战略而设立的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研究所等国策研究机关的研究者，以及参加东南亚等地的日本军政统治的研究者属于此列。他们中的很多人以追求日本帝国为盟主的“大东亚共荣”或“大亚洲主义”为理想，坚信其研究的正当性。

第二种类型是抱有国际主义政治理想、立志为国际革命运动献身而从事研究活动。比如参加1933年11月建立的号召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满铁研究人员田中忠夫，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第三国际保持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也不乏其人。

在战前和战争时期，为数众多的共产党员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坚信国际主义政治理念的同时，也成为了在国策研究机关满铁调查部工作的研究者。除了上面提到的田中忠夫，还有平野义太郎、中西功、安齐库治、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²⁴

其中平野义太郎可以说是最具特异性的。平野是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代表讲座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但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从第二类的国家主义革命家的范畴“转变”到了致力于国策研究的第一类范畴。²⁵最代表其思想“转变”的著作就是在1945年6月日本即将投降之际出版的《大亚洲主义的历史基础》（河出书房）。书中明确包含诸如“以日满华（当时

的汪精卫南京政府)为轴心”、“从英美的黑暗统治中解放亚洲,降伏盎格鲁萨克逊在亚洲的霸权,以东洋道义建设大亚洲共荣圈”等政策目的性的价值判断,他本人也强烈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与中西功的《抗战力调查》和以满铁调查部为中心进行的“华北农村惯习调查”截然不同。

平野的“主义转变”当然可以说是某种“信仰转变”,这种思想背叛是以某种发自内心的强烈愿望为背景的,很明显,这是按照内在意志进行的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向“大亚洲主义者”的充满信仰的“主义转变”。在这一点上,他与1933年日本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的“转变”大不相同。

佐野和锅山的“转变”(日文为“转向”——译注),也即他们在《改造》杂志上发表《告共同被告同志书》(1933年7月,以下简称《转向书》),之前,他们已经被捕入狱,饱受折磨。与此相比,平野并没有经历过这一切,他的“主义转变”明显带有强烈的自主性。

更何况正如吉本隆明所指出的那样,就连佐野、锅山的《转向书》,从其内容上看,也与他们的入狱和遭受迫害无关,其性质也是带有很强的根据“内发性意志”进行理论整合的产物,²⁶而没有经历过入狱和迫害的平野的“主义转变”就更是如此了。

平野的“主义转变”中毫无疑问地有两个强烈愿望在发挥作用。其一是要站在农民、工人等“劳苦大众”一方,其二是要遵照劳苦大众的意志,经过亚洲民众的国际民族大联合追求独立的“亚洲民族革命”。这两种愿望都是与“马克思主义”和“大亚洲主义”一脉相承的。

但问题在于,佐野、锅山和平野的共同之处是,在“转变”和“主义转变”之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应站在“劳苦大众立场”的目标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反而导致了越来越脱离“大众”的局面。

不容置疑,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农民和渔民等的急速贫困化,形成了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垦荒和移民的状况。明治维新以后,从前的贫苦农渔民特别是北越、信浓和东北地

区的民众中,很多人都寄希望于到北海道进行垦荒,但是20世纪20年代后北海道也遭到了严重的灾荒,逐渐丧失了接受新移民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贫困至极的民众,其新的开拓地被指向满洲,朝着战时体制发展,将天皇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皇国民族主义急速抬头,进入40年代后他们更是参与了“大政翼赞”国家体制。

马克思主义者在拥有站在劳苦大众一方的使命感的同时,却在皇国民族主义极端高涨的日本民众面前束手无策,所以从最初就必然会“游离于大众”之外。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表明其站在大众一侧的立场时,只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教条出发进行分析,吉本隆明认为这种理论上的自我完善是对日本民众的社会历史等“现实构造不相对应,只是根据理论自身进行的自我完结”,因此才导致了“游离于民众的现实”的结果。²⁷

实际上也不能说他们就完全脱离了民众社会之现实构造,但他们只专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民众的经济生活,比如工资、劳动条件、地租等经济上的阶级压迫所产生的矛盾,以及“动员民众”进行政治斗争。同时,他们却不在实践上关注民众的另一个“社会历史”的现实,就是随着明治、大正和昭和各时代历史的演进而产生的“国家幻想”。

佐野、锅山和平野等人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面对经济矛盾导致的政治局势,他们无一例外地都难以摆脱通过“动员民众”的形式进行斗争的倾向。还有一点很重要,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是民众,或者说民众只是与他们自己割裂开来的“动员”对象而已,他们自己则是领导民众的“先锋队”或者知识分子。

但是,臭名昭著第三国际的“32年指示”却突然命令日本共产党打出“打倒日本天皇制”的旗号。可现实是,当时急剧贫困化的大多数日本民众却越来越倾向于向天照大神(太阳神)后裔的天皇和在他威望之下建立的“满洲国”求助来摆脱困境。

因此片面地命令“打倒天皇制度”的只能起到让日共脱离群众的效果。这样当时很多马克思主义者不管其主观上如何追求“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客观上却不能不脱离群众甚至与群众为敌了。

从结果来看，只要佐野、锅山、平野等人继续保持其领导日本群众的先锋队意识，就不得不站在拥护天皇制度的立场而选择背叛共产党、投靠“皇国民族主义”的道路。平野义太郎认为，“皇国民族主义”要以明治维新以来的“尊皇”爱国为基础，“以皇恩普照天下之公道为基础将亚洲各兄弟民族团结为一个大家庭，来保卫亚洲，是皇国的当务之急”。²⁸

对于平野义太郎的这种明确的目的性价值判断，当时的现代中国研究者和“大亚洲主义”的实践者们都是非常认同并自觉进行的。但是以中西功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即致力于世界革命的第二种类型的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却并非如此。

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作为国策研究机关的研究者的同时，却认为他们自己的研究并不是配合殖民地统治和侵略大陆的国策，只是纯粹的“客观”研究而已。在他们看来，这种追求“客观”的研究，自然就可以证明日本侵略大陆的不合理性和破绽，并成为对其国际主义政治理念的跨国革命运动之目的具有价值的研究。²⁹

问题就在于他们认为，作为革命实践者在政治立场上他们拥有目的性价值判断，可作为国策研究机关的研究员却可以在研究中不夹杂任何政治目的。就是说，第一，他们认为作为革命者的自己和作为研究者的自己可以截然分开；第二，他们形成了一种成见，认为革命实践者将目的性价值判断带入到科学研究中将有损于研究的“客观性”。这两点正是他们的症结所在。

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党员采用了躲进国策研究机关的手段来避开当时治安维持法的政治迫害，作为研究员有意选择了不将自己的政治立场带入其研究的做法。

但是他们在坚信只有超越国境的革命取得胜利才是“历史的必然”的同时，也信奉遵循只有“客

观”的研究才符合历史法则的科学主义。因此他们认为确保了科学“客观性”的研究就必然有利于革命运动的研究，所以才可能将革命家的自己与研究者的自己完全区分开来。

事实上，作为革命实践者的目的性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会在他们的研究中发挥作用，只是他们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将目的论编入方法论的重要性而已。

这种情况下，正如前述，方法论上的无自觉意识虽然未必直接导致目的论与因果论的混同，但却不可否认将增大混同的可能性。就是说在情报的分析上容易产生过于或只重视有利于革命胜利的要素。

第二，对于研究成果如何被利用，会产生什么结果，容易产生研究者不会自觉认识到应负有何种责任的问题。

换句话说，假设真的有学者忠实于日本军部的国策所追求的目的，为了论证日军侵略中国的成功而从事研究，这种研究并不一定就缺乏“客观性”。事后招致日军失败的结果并不能说其研究就是缺乏“客观性”。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是否自觉地认识到了在方法论上应严格区分目的论与因果论并付诸于行动。

(2) 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研究及其方法论上的问题

在战后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中，由于日本已无法像战前战中那样发动侵略战争、进行军政统治和推行殖民地政策，上述第一种国策研究基本上就消失了。同时，基于国际主义理想从事跨国研究的第二种情况，除了在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工作的研究者之外，基本上也销声匿迹了。特别是以世界革命为己任从事研究工作的研究者更是急剧极少。

世界革命组织第三国际的解散（1943年）、1956年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国际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的解散、70年代末中国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披露等，都对日本社会弥散着的社会主义共